

評介翟新《東亞同文會與中國—— 近代日本對外理念及其實踐》

廖代翔*

書 名：《東亞同文會と中國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
念とその實踐》

作 者：翟新

出版社：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出版時間：2001 年

頁 數：316 頁

—

在日本近代對外關係史上，諸多民間對外團體，對於日本外交認識的形成、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執行，都或多或少有所影響，其中東亞同文會（1898～1946）可謂獨樹一幟，其成員雖不乏曾活躍於中國的大陸浪人，其對外認識亦深受大亞細亞主義的影響，然而由於其財務以及人事方面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因此其對外觀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日本官方的外交政策，相當程度上亦受其制約。過去針對東亞同文會所進行的研究，多半聚焦於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歷史教師。

亞同文書院的文教事業及中國調查活動，或是其首任會長近衛篤磨的對外觀如「支那保全論」。相較之下，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各個階段當中，東亞同文會的中國觀有哪些變化？卻較少有學者觸及。本書是以作者在慶應大學的博士論文為藍本加以修改，欲以東亞同文會的對外理念及其實踐行動，做為探索戰前日本中國觀的出發點，並探究大亞細亞主義的本質，同時試圖闡明官方政策與非政府團體的對外認識間的關連。

二

本書內容共分十章，除了第一章說明問題意識，以及第十章結論之外，二至九章的概要介紹如下：

第二章「對外理念及其實踐的原型——荒尾精的中國觀」。荒尾精與同時期的大陸浪人在中國觀上有以下的共同點：一、軍事上的使命感以及政治意識；二、改造中國的興亞民族意識；三、對於日本政府所採取慎重的對華政策抱持不滿的對外強硬態度。其中漢口樂善堂從事的情報收集與分析，成為建構其中國觀的主要依據，其後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商權競爭論亦具有戰略目標，其所追求對於大陸市場的支配，和直接的政治干預亦相輔相成。而其預見甲午戰爭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將形成與歐洲各國在華的對立，若中日交惡，勢將阻礙日本對華擴張，無不影響了日後東亞同文會的中國認識。

第三章「對於十九世紀末期中國改革運動的對應」。東亞會與同文會於 1898 年 11 月合併為東亞同文會，此時正值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尋求奧援之際，但在同年底東亞同文會對康、梁的態度卻由重視轉為疏遠，之所以有如此的轉折固然與東亞同文會成員的建議與外務省的勸告有關，但基本仍是基於近衛篤磨自身的對外認識，近衛協助中國改革的目的是在於擴大日本在華利益，因此對於康、梁的支持也是相對性的，一旦康、梁的影響力下降，失去利用價值，則轉向迎合與其對立的清朝及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實力派總督。

第四章「義和團事變時期的『聯邦保全』構想」。義和團事變爆發後，根津一提出的「聯邦保全」案儘管成為東亞同文會的方針，然而由於東亞同文會領導階層以及實際從事在華活動的會員之間意見不一，以致於雖然在建立清朝以外的親日、並接受日本保護的政權這點上態度一致，然而卻在選擇合作對象——南方總督、唐才常自立軍、孫文惠州起義——方面各行其是。其後隨著俄國利用八國聯軍之機進佔滿洲，東亞同文會的關注焦點北轉，聯邦構想遂遭擱置。

第五章「在中國的輿論形成活動—以同文滬報為中心—」。1900年創刊於上海的同文滬報，代表了近衛篤磨等東亞同文會領導階層的事業方針，即創設學校、新聞言論機關以啟發中國風氣，追求中日合作，促進中國的開化。同文滬報的宣傳內容承襲了東亞同文會自1898年底以後與康、梁劃清界限，而顧慮南方有力總督，尤其是劉坤一意向的方針。而1901年11月，同文滬報轉賣給外務省，意味著東亞同文會藉由華文報刊影響中國輿論的任務，以及對日本政府採取批判態度的時代都宣告結束，其對華活動主要轉移到教育、調查研究等文化活動。

第六章「辛亥革命與初期共和國家認識」。日俄戰爭後東亞同文會對於清朝的統治及新政給予肯定評價，但同時對於中國方興未艾的收回權益運動以及革命、維新之爭仍抱持疑懼的態度。當辛亥革命爆發之際，東亞同文會內部意見紛歧，但藉此擴大日本影響力的態度則是一致，皆以是否利於日本為判斷基準。同樣的，東亞同文會對於中國革命的立場，也是基於革命對於中日關係的影響，而並非針對共和制本身的評價。反對洪憲帝制以及聯省自治亦是為了避免造成中國動亂，予以列強可乘之機。在民國成立後，東亞同文會部分領導階層所提倡的日中同盟論也是在中國保全的名義下，強調日本權益優先論。

第七章「在中國的調查活動」。東亞同文會在華的調查活動與根津一關係密切，日俄戰爭後，根津一認定歐美列強在華利益維持相對的均衡，遠東暫時處於安定，因而將焦點轉向經濟競爭

(但並不侷限於此)，而由支那經濟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擔負此一角色。而具體成果之一「支那省別全誌」也特別留意歐美在各省的經濟活動，體現了與歐美競爭的意識。由於東亞同文會的中國調查活動是在日本政府補助下進行，自然不免受其制約，調查成果也當然被日本政府、軍部利用於軍事、政治方面。

第八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中共存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東亞同文會跳脫人種、文明、地理關係，以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為主軸，提倡日中共存論。但對於中國無論北京政府抑或是南京國民政府達成統一皆抱持悲觀態度，對於中國傾向蘇聯、美國的外交無不感到疑懼。面對歐美，強調日中共存；面對中國卻又強調與英美的協調外交，兩者似有混淆。由此可見其欲依賴日本的既得利益，以展開國家間的經濟活動，和中國的回復國權運動（以不平等條約為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脅，追求對等立場的與外國共存）也必然相互對立。

第九章「滿洲事變時期的時局觀」。東亞同文會對於滿洲問題的觀點曾有多次轉變，在近衛篤磨時代強調與歐美妥協，列國協調以對抗俄國獨佔滿洲，保全中國領土以謀求日本利益；進入大正時代，不侷限於既得利益，欲進一步以滿蒙為獨佔勢力範圍。到了九一八事變（即日本所謂滿洲事變）前，東亞同文會主流論點雖然是同時強調滿蒙特殊權益與尊重中國滿蒙主權，但九一八事變後卻自我否定了中國主權論，而積極主張承認滿洲國。另一方面，其滿洲觀亦與其對歐美觀點的變化相關，蓋從國民同盟會時代強調日本與英美利害一致，到一次大戰後轉向與英美對立論。隨著滿洲國的建立、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更認定日本與英美的對立無解，而提倡東洋門羅主義、日中聯合以對抗歐美，基於同文同種的地域觀，承認滿洲國的政治現實，揚棄中國保全論，代之以亞洲保全、聯合論。

三

關於東亞同文會，過去已有不少學者進行探討，然而既有的

研究成果多半聚焦於以下兩個層面，首先，將東亞同文會定位為興亞團體，在大亞細亞主義的架構下，探討「支那保全論」在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事變中的理論及實踐行動；其次是東亞同文會最具代表性的事業——東亞同文書院及其所代表的中國調查事業。本書則嘗試打破時間及活動層面的限制，對於東亞同文會從成立至解散，在中日關係的不同階段，其對外理念的變遷加以探討，此一研究方法的創新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一個優點。另外，過去對於東亞同文會的研究，多半是利用近衛篤磨、白岩龍平、井上雅二、宗方小太郎等相關人物的日記、關係文書以及傳記等，作者則大量運用了「東亞時論」、「東亞同文會報告」、「支那」等過去較少被利用到的一手史料，這是本書的第二個優點。第三，由於東亞同文會自成立以來在財務及人事方面都與日本政府密切相關，對外理念自然也無可避免受到日本外務省的制約，因此作者也特別注重其對外認識與日本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這也是在東亞同文會研究上的一個新方向。第四，作者特別指出了東亞同文會的中國調查事業是以重視經濟利益的獲得，為其在華經略的一環，這種以商業發展為對華經略根本的方針，正是甲午戰爭前荒尾精與根津一對華經營策略的延伸，說明了東亞同文會與荒尾精在對外理念上的延續性。

然而，本書也有若干值得商榷的餘地。首先是關於荒尾精，作者認為其「唇齒輔車」的中國觀，與其說是人種、文化上的連帶觀，不如說是以地緣政治學的國際政治觀為基礎，並且一貫否定日清同盟。但此一觀點一來與作者所主張荒尾對於甲午戰爭的定位（日本做為東洋先覺者，從對抗西力東漸的角度，為了確立其東洋世界盟主地位的興亞事業必要之一環）似乎自相矛盾。二來徵諸於史料，荒尾精雖然認知到當時中日兩國為了朝鮮問題而交惡，但他更憂心的卻是西力東侵的危機：「歐亞之兩陸，東西文化異，黃白之兩色，本來種族不同，所謂西力之東漸，豈非意味兩者之競爭」，因此在甲午戰爭期間，他依舊強調「唇齒相依，手足相扶，欲以挽回東亞之大勢，以斥西歐之侵略，為我國做為天

職，所以啟掖清國之富強之本旨」¹，很明顯的是要建立使中國承認日本的東洋盟主地位、並從屬於日本的同盟關係。即便在戰後，他所堅持的亞細亞共同體連帶意識及興亞政策仍然可謂一以貫之，未曾稍變²。作者對於荒尾精對外觀的理解，似有商榷餘地。

其次，無論是庚子拳亂期間以張之洞、劉坤一為交涉對象的聯邦保全構想，抑或是對於其所主導東南互保的肯定，以近衛篤磨為首的東亞同文會領導階層始終將張、劉視為中國改革希望之所在。相較之下，對於在戊戌政變後已然失勢的康、梁，則是顧慮劉、張的意向而與其劃清界線。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報「同文滬報」在八國聯軍的醞釀以及交戰階段，其論說也秉持此一對華認識。然而到了辛丑和約的議約階段，「同文滬報」對劉、張的評價卻急遽變化，認定其不堪中國改革之大任，甚而主張由康、梁重新掌權。這與「同文滬報」自創刊以來的一貫主張以及近衛的方針都背道而馳，「同文滬報」的言論立場何以有如此劇烈的轉變？是否和東亞同文會領導階層與部分在華人員及「同文滬報」之間在中國認識上的意見分歧有關？作者卻並未進一步分析。此外，東亞同文會在中國興辦的報紙甚多，包括「亞東時報」、「漢報」、「閩報」等，為何獨以同文滬報做為探討對象？是否是因為上海

¹ 關於荒尾精的對外理念，荒尾精，〈東方ノ大勢ヲ論シテ對清問題ノ重要ヲ述ヘ我國百年ノ長計ニ及フ〉，《對清意見》，頁82、89，收於《東方齋荒尾精先生一遺作覆刻出版一》（東松山：靖亞神社先覺志士資料出版會，1989年）；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東京：大空社，1997年。覆刻自東京：左久良書房，1910年原刊本），頁145-150。

² 陳豐祥，〈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台北，1994.6），頁31，總頁257。荒尾精在甲午戰爭末期所著的《對清辨妄》中，對於中國的國民性依然抱持高度肯定：「彼國民本來剛毅之民也，堅忍不拔之民也，……清國民之氣稟性情蓋如此，如此之人民有三億八千餘萬也。斯民若訓練統帥得其宜，可以使蹈白刃也，可以使入水火也。所謂雖可奪三軍之帥，不可奪匹夫之志也」。因此即便在日本連戰皆捷之際，仍舊「大聲疾呼，欲告朝野之志士仁人，東洋之大事唯有日清兩國協心戮力經營之一途而已。若失此一途，茫茫大陸不歸於西歐諸國宰割分食者幾希也」。足證其對於日清同盟論以及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堅持。荒尾精，《對清辨妄》，頁24、27-29，收於《東方齋荒尾精先生一遺作覆刻出版一》。

在中國報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³？應當更明確的加以說明。

第三，作者認為 1902 年 4 月國民同盟會解散，及 1903 年 5 月東亞同文會廢除上海支部以外的所有華中支部，象徵了東亞同文會的對華活動由政治轉移到了教育、調查研究等文化領域。然而國民同盟會之所以解散，是俄國在英日同盟的壓力下，於 1902 年 4 月宣布於 18 個月內分三期自滿洲撤軍，緊張局勢暫時和緩所致。當 1903 年 4 月俄國拒絕履行第二期撤軍時，對俄（露）同志會旋即繼起鼓吹對外強硬論⁴，無論國民同盟會抑或是對俄同志會，包括神鞭知常、佐佐友房等核心成員皆與東亞同文會關係密切⁵。徵諸史實，作者的論點顯然有可議之處。

第四，第六章的標題為「辛亥革命與初期共和國家認識」，但其中第一節為「清朝末期政局觀」，卻是以 1905 年日俄戰爭以後清朝的新政改革與立憲運動為內容，說明東亞同文會在清季立憲與革命之爭中的立場，則此章標題似乎應略加調整以符合本章內容。而辛亥革命爆發之初，東亞同文會的成員間在維持清朝、策動滿蒙獨立、與支援革命之間莫衷一是，最後何以改變原先傾向立憲的態度，而轉向支援革命，當然擴大日本影響力的動機無庸置疑，但關鍵原因為何？似乎可更加深入分析。此外，在本章中論及 1917 年由根津一等人所提出的日中同盟案，根津一是荒尾精主持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得力助手，曾主編「清國通商綜覽」，顯然深受荒尾精商權競爭論的影響。在日俄戰爭後，根津認為當前遠東問題的焦點在於列強環繞著中國的經濟競爭，此一日中同盟案又正值寺內正毅內閣時期，寺內內閣對華政策的基調、著名的西

³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19-21、252-254、257-259、273。

⁴ 從國民同盟會到對俄同志會的遞嬗，見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中下 3 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3、35、36 年），上卷，頁 706-725。黃福慶亦認為東亞同文會在近衛篤磨以及長岡護美相繼去世後，根津一主導其活動方針，始逐漸著重於東亞同文書院等教育文化事業，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頁 63-64。

⁵ 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對支回顧錄》（上下 2 卷，東京：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1936），上卷，頁 683。

原借款亦是強調以「日支」經濟親善做為同盟的基礎⁶。東亞同文會對於西原借款的看法為何？兩者的理念之間是否有互為表裡之處？似乎也值得更加深入探討。

第五，本書討論的時間斷限終止於 1933 年塘沽停戰協定簽字，但東亞同文會直到 1946 年方才解散，這十餘年間正是中日關係走向全面戰爭的階段，然而作者卻並未對於東亞同文會在這段期間的中國觀加以探討，是否是因為如作者在序論中說明，東亞同文會在九一八事件後，追隨日本國策的傾向愈加明顯？作者卻並未加以說明，這點也應該加以交代清楚。

最後，本書的問題意識之一，是希望藉由闡述東亞同文會的對外理念及其實踐，以說明大亞細亞主義的本質。作者認為雖然一旦日本與英美在中國問題上關係緊繃，在東亞同文會內部就有部分人士主張以日本為盟主、聯合中國，以對抗來自歐美的分割危機之類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但與歐美妥協以因應東亞問題是東亞同文會長年以來的主導論點，其中國觀與大亞細亞主義有相當的差距。然而這似乎忽略了東亞同文會的對外理念中，講求與英美協調的官式外交路線，與強調日中聯合的大亞細亞主義，這兩種不同的對外認識時而對立，時而卻又互相交錯⁷。一旦日本與英美關係陷於緊繃，或是國際情勢有利於日本對外擴張，其若干

⁶ 勝田主計，《菊の根分け》，大正7年12月，收於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頁288-291。勝田為寺內內閣的大藏大臣，與西原龜三同為西原借款的核心人物。

⁷ 1900年9月，國民同盟會成立時即宣示：「一方面依循列國聯合之初衷，主持支那保全；另一方面沿襲甲午宣戰之宗旨，扶掖朝鮮之傾頽，以克復大局之和平，非我國民之權義哉。當盡此權義與列國永相聯合之同時，無學趨趨逡巡左視右顧之陋，要有以自主之精神，必貫徹所信之大決心」。雖然強調東亞同文會保全支那、扶掖朝鮮之宗旨，卻又不能無視日本當時需聯合列國，方能制衡俄國之國際現實。其後當1902年1月第一次英日同盟締約，近衛篤磨立即大表歡迎：「與強國為伍而結此等之同盟，此為明顯增進帝國地位之一步，帝國不可不維持伴隨此地位之威信與尊嚴」。足證東亞同文會在日俄戰爭醞釀階段的對外理念當中，大亞細亞主義與英日同盟並行不悖。〈國民同盟會宣言案〉、〈國民同盟會の解散に就て〉，收於近衛篤磨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磨日記》（6冊，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3冊，頁310；第5冊，頁87。

成員即不時主張擺脫仰人鼻息的協調外交⁸。作者也注意到在一次大戰後東亞同文會已認識到由於人種、利害關係的分歧，日本與英美之間的衝突將勢所難免。從外交史的角度觀察，一次大戰期間，日本利用列強無暇東顧之機，肆行對外擴張，戰後則更進一步對於當前以英美利益為本位的國際秩序是否合乎日本利益提出質疑，東亞同文會內部亦不乏對於協調外交加以省思、批判的聲浪⁹。東亞同文會現實主義的對外觀，究竟是基於對大亞細亞主義的否定？抑或是因為受到協調外交的制約？這兩種外交理念的拉扯，是否對於東亞同文會的對外認識及活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都值得進一步探討。總結而言，本書的部分論點固然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其使用大量一手史料，在問題意識上另闢蹊徑，所提出的觀點亦頗值得更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可說是關於日本近代對外團體研究的新穎之作。

⁸ 例如小川平吉於1914年11月，即將接任東亞同文會幹事長之際，即表示「由來我國之外交有優柔寡斷，窺外國鼻息之弊」，主張「日支兩國真有唇齒輔車之關係……故兩國共同保全支那固有之領土，提攜支持東亞之大局，以增進黃種人之文化，實出於自衛之必要，亦實無非我國之天職」。小川平吉，《對支外交東洋平和根本策》，大正3年12月，收於小川平吉文書研究會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2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卷2，頁83、85。

⁹ 例如日後接任東亞同文會會長的近衛文麿，在一次大戰甫結束之際，即認為日本輿論向來以英美價值觀馬首是瞻，不加批判的照單全收。當前國際秩序對於已掌握殖民地利益的英美而言，可謂良善，因而其力主和平；但對於缺乏發展空間的德國而言，則極不公平，因而其亟欲打破現狀，訴諸於戰爭。當前日本的處境與德國相同，應力求打破現狀，站在日本立場本位，確認自身的正當生存權，一旦受到壓迫，必要時當不惜捨棄和平，抗爭到底。近衛文麿，〈英米本位の平和主義を排す〉，《日本及日本人》，746號，大正7年12月15日，頁23-26。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小川平吉文書研究會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2 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東京：大空社，1997。
- 村上武編，《東方齋荒尾精先生一遺作覆刻出版－》，東松山：靖亞神社先覺志士資料出版會，1989。
- 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對支回顧錄》，上下 2 卷，東京：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1936。
-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磨日記》，6 冊，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中下 3 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3、1935、1936。
- 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 翟新，《東亞同文會と中國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念とその實踐》，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

二、期刊論文

- 陳豐祥，〈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臺北，1994.6），頁 227-265。
- 近衛文磨，〈英米本位の平和主義を排す〉，《日本及日本人》，746 號，大正 7 年 12 月。